

官妻

生采 著

老公是大樹，
老婆好乘涼？

延邊人民出版社

生 采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官 妻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刘 凡

封面设计:乔 枫

版式设计:陈 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 妻/生 采著. -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1

ISBN 7-80599-281-9

I. 官… II. 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1050 号

官 妻

生 采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吉林市教育影印厂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数:1—3000 册
9.125 印张 226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9-281-9/1·68

定价:16.80 元

内容提要

轰轰烈烈的政府机构改革正在全面展开。市委书记朱宁因车祸不幸突然死亡。女儿蕾蕾本来一直成绩看好，却因丧父心情欠佳而以一分之差未能考上重点中学。妻子市人大副秘书长卢思敏为了女儿蕾蕾能上重点而东奔西走，均无功而返。好友肖玫不得不以钱为代价让蕾蕾进了重点中学。

为了女儿，为了朱宁的母亲，卢思敏一直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市政府、市人大就要换届，卢思敏不得不每日与政府、人大的官员们周旋，其间有对官场黑幕的奋力抗争，有对人大工作的倾心尽力，有对朱宁的苦苦思恋，也有对世态炎凉的深刻体验。

女儿的成绩越来越好，身子也越长越高，换届选举大会的日子越来越近，卢思敏在受了女记者毫不留情的刺激后终于从丧夫的悲痛中解脱出来，精神越来越好。

自己撤回“平调”的请求后，卢思敏从众多的候选者中脱颖而出，当选为市人大副主任，她的当选靠的是自己的实力，还是其他什么……

第一章

楼道里黑漆漆的。

卢思敏离开家的那天晚上，楼道里也这么黑。

她扶着栏杆，双脚“感觉”着台阶，踉跄地爬上来。

早先，楼梯间都装着壁灯，楼道里并不缺少光亮。只要哪盏灯坏了，产权单位立即派人来修。而今，已经十个月没人查看了。

她知道屋里也是黑漆漆的。

屋门很严实。防盗门仿佛一块铁板嵌在墙上。但是，只要朱宁在家，客厅的融融灯光也会从隙缝里挤溢出来；只要看见那一缕光亮，就会陡然增加她的期盼或热望，她会心意酣畅地进入自己的家。而她仿佛就是太阳，当她步入客厅时，那些熟识的或陌生的客人的一张张脸，仿佛变成一朵朵向日葵，争着抢着向她转来。她记得最清楚，原先的组织部长、现在的代市长石乃村是她家的常客，每次见她回来，总起身迎过来，接过她手中那个并没

分量的拎包，用过于浓重的乡音甩过一句无关紧要的客气话——回来啦！然后欢颠颠地提着她的包，轻手轻脚地绕到门后，把那包儿挂在衣架上。而她在鞋架前换了拖鞋，含着微笑，从客人面前穿过去，直奔厨房，系上围裙忙自己的事去了。

说实话，她不喜欢朱宁在家里“办公”。她曾或婉转地或直率地提醒客人：蕾蕾就要升高中了。

但客人照旧来。既然来了，还能撵走吗？朱宁也是一脸无奈。

卢思敏也很无奈。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沙发的上方贴出了一张“告示”：小女要考高中，说话请低声点儿！这一招儿果然见效，客厅里倒能听见蕾蕾朗读的英语，或隐或现，或高或低，卢思敏感到一丝欣慰。

在来客中。如果说她对石乃村心存厌烦的话，那末，她对梁恒这个老头儿就有点不恭了。他比朱宁年长十几岁，担任市委副书记。他对市委书记的“权力倾慕”，使他忘记了年长者的尊严，最讨厌的是他那种“磨缠”劲儿，他可以在朱家的沙发上纹丝不动地泡上整晚，但所带来的信息量，卢思敏甚至用不了三句话就可以概括。

不管怎么说，那时的朱家是很热闹的。

如今，这屋子已归于寂静。

在黑暗中，她打开门，摸着开关，屋顶中央那盏枝形灯把客厅骤然照亮。

卢思敏的眼睛也随之一亮：屋角花架上那盆君子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了。绛黄色的花朵分作两簇，挣出宽密的叶丛，高高挺立着，在桔黄色的灯光下，显得新鲜动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花。她喜欢君子兰，它的灿烂夺目原本是为吸引人的。

去年，君子兰开花前，她几乎有一种急切，在这花架前消磨了许多时间，待到第一朵花瓣舒展腰枝渐渐绽开时，她几乎惊叫

着唤过丈夫和女儿，快来看吧，它终于开了。卢思敏记忆神经活跃起来，一首唐诗被她改掉一个字，随口冒出来：好花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阵子，她的笑面如花，真情如花，希望如花，生命亦如花！

或者说，她这种如花的心态恰恰是从朱宁身上传导过来的。那天，他刚刚送走省委组织部的六位同志。组织部长侯林带着干部处的五位同志是来S市考察市级领导班子。令朱宁慰藉的，不仅是侯部长婉转传递的那种满意，而且主要的，在民主测试中，他得到了绝大多数参评干部、群众的拥戴，百分之九十七的选票都给他划了“优秀”。这份结果是干部一处的处长“无意”中透露的，处长显得有点惊讶。而朱宁反倒有点内疚，他觉得来S市不过五年，好多该做的事还没开始去做，许多做了的事，未必件件都好。这样的评价实在有点过誉了。

外界嚷嚷说，朱宁要提拔了，去省里任副书记。

卢思敏脸上虽说很平静，但心里倒乞愿这种小道消息真的会变成红头文件。

她在花架前默默地数着花蕾。

数到最后一朵竟是十七，她不禁一怔。“七”不是“气”吗？时下许多人都这么说。但她很快恢复了平静，喜气洋洋地向丈夫报出另一个数：十八朵！

直到她独自进了厨房，心里还怪怪的……

现在，那花竟是两簇。

她再也不敢去数了。

她突然觉得，那花终究要谢的。它是那么柔弱。再美再繁也经不起朝来寒雨晚来风啊！

她从花架旁走开时，才发现手中仍握着那只藏蓝色旅行包，这才把它扔在沙发上，朝电话机走去。

这是部录音电话。她和朱宁外出的时候，哪怕是出席音乐会

这点功夫，粗哑的、苍老的、简捷的、冗长的声音与话语，一律都是客客气气的——都会注入进去，她不得不用满是旋律的脑子，去分辨这些声音，从中挑了最该回复的，有时是她，有时是朱宁再打过几个电话去。

捡拾这些电话，未见得都是索然无味。

有的电话是打给她的。陆震的语气常常是直冲冲的。她宁可相信这是命令：

——卢思敏，出席苏州会议的材料准备好了吗？要抓紧时间，那边又来了通知！

——卢思敏，全市信访工作会议你去参加！

——卢思敏，你明天去一趟财政局，找南雁说说，让他拨点汽车维修费！

陆震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她的顶头上司。对他的电话，是必须复的。

卢思敏很敬佩陆震。他满脑子装的全是工作。听说，他做县委书记时，跟地委书记汇报工作，不用看本儿，一连串情况、数字仿佛水似的滔滔不绝地流出来。还听说，在要武斗不要文斗的那段时日里，他居然安然无恙，和羊倌儿一起，优哉游哉地度过了三个月。后来，他证实，造反派中出了“叛徒”，押解途中，让他“方便”得无影无踪了。卢思敏还亲眼见过他和庄户人的情谊，有一年春节去给他拜年时，正碰上二十多个“贫下中农”来看老陆。他们带来些黄豆、绿豆、粉条，还有一些秫秸编的笼屉盖子。老陆兴高采烈地让座、点烟，把盛满花生、红枣和糖果的盘子推到他们跟前，一面又高声喊叫老伴儿，赶快做饭！

陆震老了。他从市委书记的岗位上，移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位置上，已经五年了。他在与朱宁极为简短的交接中——其实，就是个座谈会，是一种没有摆出任何架式的随意聊天——极为诚恳地说，我拼上老命也得把人大工作干好。

朱宁几乎是抱着他的手，许久，许久，什么话也说不出。

陆震一次也没来家找过朱宁，或者说，朱宁与他的频繁的主动的联系，毋须他登门造访。每当陆震打电话找他有事要说，朱宁立刻就说，你不要离开，过二十分钟我就去了。市委大楼离人大的办公大楼，不过十分钟的车程，要碰到“高峰”，二十分钟也得司机巧于周旋。朱宁没有一次失约。

陆震对他的继任者，没有冷眼旁观，也没有絮絮叨叨地摆出老者风范“扶上马，再送一程”！干部是党的干部，何况，他已经看出来，朱宁当得好市委书记。他只是不忍心让朱宁单人独马地担这副担子，总有一种渴望，甘心情愿地为他分担点什么。所以，在朱宁担任市委书记的第一年里，他搜集到的意见、建议，数陆震的多。陆震把他听到的、看见的对党的工作意见、反映，直冲冲地全对朱宁讲了。有时尖锐得直让朱宁脸红心跳。这一点连卢思敏都感觉到了。

有时，她说，陆老头儿让你难堪了吧？

朱宁感喟地说，花钱也难买那份真诚了！

卢思敏有时会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把陆震的电话录音专门收集在一起，交给一位与陆老头未谋一面的文学家去听，会不会塑造出一个凶神恶煞来？

但卢思敏却能清晰地理出他的工作轨迹，感受到他对人大工作的热烈情怀。

这阵儿，陆老头儿自然不会再打电话来。

省人大召开的人大宣传工作会议，原来说定是陆震和她一块去的。后来听说市里有事，他临时又叫郝副主任去了。

他知道她不在家里。何况，马上就要换届，这方面的事也够他忙的。

但是卢思敏还是开启了录音系统。一种习惯，或是一种下意识，又使她凝神倾听起来。

但她听到的仍是沙沙声。

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感到有点落寞。

待那面磁带转到另一面时，突然传出一个声音，倒把她着实吓了一跳。

卢思敏，你到家了吗，向你问好，晚安！

这声音，那么陌生。接下来，又是沙沙声。

谁打来的电话？

她倒过带去，又听了一遍。

哦！听出来了。这个倒霉蛋！

电话是从省城打过来的，打电话的人是她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沈允中。现在他在一所大学里，专门研究魏晋文学，已经出版了不少专著。

卢思敏为这惟一的电话，显然很激动，她发觉自己的双腿有点颤栗。

她在省里有不少同学。同届的，不同届的。一个专业的，不同专业的。每每到省里开会，卢思敏总是要给一两个极要好的打个电话。平心而论，她绝不是为炫耀她丈夫“一方诸侯”的尊崇的身份，而只是想打发突然袭来的单调或无聊。但每次，一两个同学会邀来一大群人，有熟的，也有不熟的。有的是毫无功利地来聊聊坐坐，有的给她带来“菜单”，托她在S市办点什么。

许多年来，她不曾给沈允中打过电话，他也不曾相随着老同学聊过一次，她只是听说，魏晋文学使他自己也变得超逸起来，四十多岁了还在做快乐的单身汉。

这次，她去开会，虽是她近十个月第一次在省里露面，但她决计不给任何同学打电话。不知为什么，她变得怕见熟人。但人大理论界仍然没有多少新面孔。省人大常委会机关里仍有不少人来到住地看她。《人民之友》报的一位副主编，在寒暄之后，仍然拐弯抹角地道出了她最怕听的话：以后，多出来走走么！我们还

是希望读到你的大作！

噢，烦死人了，等他们刚离开，她就和衣睡了。半夜醒来，发现心仍是湿的，枕头也湿了。

来省城前，她就有个想法：要找找侯林部长。侯部长不仅曾是朱宁的上级，而且和卢思敏也熟。她第一次见侯部长是在文化厅的小会议室，她和朱宁的婚礼上。最后一次见他时，她已被严密“看守”，昏昏沉沉，欲哭无泪了。她是想让侯部长捎个话儿，给刘磊，给石乃村。她希望调出人大机关。但是，真要找到他，得费很大神通。万一传到郝副主任耳里，岂不成了把柄？因此，她只得打消了这个主意。

她拿到回S市车票的那天晚上，仿佛神差鬼使般地，关了电视，坐在电话机旁，拨通一个号码。这号码是别人告诉过她的，那七个号码仿佛刻在她的心上，不假思索地变作一声呼唤。

接电话的正是沈允中。

二十分钟后，他居然来了。卢思敏真的吃了一惊。也许心里头“存”他存得太久，猛一见他，心禁不住狂跳，脸也涨得通红。那种劳燕分飞的疏离，隔天隔地的惦念一时竟使她不知所措。

他也盯住她的脸仔细端详——那张年轻漂亮的脸已经嵌入他的心底，而现在却像一只按捺不住的葫芦硬往上蹿。她也扫视着他，有一种渺远、飘忽的感觉。

一时，她竟不知如何开口。慌乱中想起了给他沏茶，拿热水瓶时，竟然打翻一只茶杯。

他摆手说，我没功夫喝热茶。一个研究生还在我屋里和我讨论问题，我跟他请了二十分钟假。

过了会儿，他又说，S市不错吧？我一直想去一趟，就是太忙。接下来仍是无言地相对着。

她的眼光掠过他头顶中央那光亮的一片。

他笑笑说，已经秋天了。草该黄了。说完又笑。

最近有书出版吗？她问道。

他点头。过一会又说，生命像是昙花，你用心血浇灌了许多年，才有笑看天下的那一瞬间。然后，看看表，他说该走了。

他不让她送。因为她赶不上他。他跑着出了宾馆。

望着他的背影，突然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占据她心中的朝朝暮暮，难道让时间的河流吞噬了吗？难道世上没有不可磨灭的风景吗？

现在，她实在弄不清他为什么会来电话？

是对他过分匆忙的一种补偿？还是记忆的碎片又连缀起来，依稀看见一点当年的璀璨？

初春的天气很冷。凉气仿佛从指尖向全身扩散。

她仍站在电话机旁。忽然醒过神来，她问自己，你站在这儿想干什么？

哦，应该给蕾蕾打个电话。

第二章

不经意间，她突然看见沙发上方的粉墙上，仍留着粘贴过字条儿的残痕，那是曾经限制客人高声说话的“告示”。虽然在朱宁逝世后，已经撕扯了，但粘贴处与其他墙面显然不同，很有些刺目，仍令她想起那时的“热闹”来。

是热闹吗？不，这儿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热闹。这里从来就不是海侃神聊的地方——那需要一种平等精神。而在这里，只是个旋转舞台。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不是“汇报”，就是“听取”，再不就是来讨主意、讨赏赐、讨位子。曾在这几只沙发上循规蹈矩地耗过光阴的人们，在缺少朱宁的“卢”家，多数不会露面了。

想想也真有意思。连卢思敏给客人端茶倒水，都可以成为一种政治润滑剂。来润滑市委书记与他属下之间的关系。有时，她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有时，更具有表演性质、展示性质、塑造性质，好让外人知道市委书记还有个温馨的家，还

有个素质很高的妻子。和朱宁一起显示一种整体的优美。

她却没有什么时间也没有多少必要往别人家跑。

直到这个家开始冷落，她才意识到自己仿佛在旷野里赶夜路，唱着歌给自个儿壮胆，朋友简直太少了。

那时，朱宁也不主张她有过于频繁过于密切的交往。他怕一些人通过她，惹出些麻烦来。陆震曾对朱宁说过一句话，至今她记忆犹新。他说，女人的项链，有些时候可以变作男人的锁链。这是他观察了许多行贿受贿案件之后，得出的经验之谈。这也是一位老市委书记沉甸甸的嘱托。

卢思敏做到了。她仿佛是一个身披铁甲的武士，忠心耿耿地把守着一座城池。而她手中的武器，就是冷淡与陌生，一副凛然难侵的样子，远拒着试图逼近的“敌人”。

有时候，她家也来一些局长或乡镇书记、乡镇长们。她除了沏一杯茶外，从不问他们姓甚名谁，甚至连他们的面孔也没看清，就隐形于自己的卧室中。

她是个学中文的，大量文学作品的熏陶，使她往往对女性的遭际产生切肤之痛。即使她们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在穿流污浊时，也难保留自己的本性。女人需要智慧，拥有智慧的女人犹如握有一把双刃利斧，不仅使进犯者望而生畏，也可以在自己前行的路上披荆斩棘。

卢思敏不能说自己具有足够的智慧。但她坚信自己永远保持清醒。拒之千里的冷峻虽说十分笨拙，但它却像写在脸上的宣言，昭示着朱宁的也包括整个家族的正气。

朱宁逝世之后，市委书记的权威，书记夫人的“宣言”，以及那种畸型的“热闹”都随之结束了。突然的落寞也迫使卢思敏清醒。她得“走出去”，谨慎地重构属于自己的人际关系。挑着拣着和几个人来往起来。

首先是陆震。她和他分属两代人。但是，她在他面前，有一

种师生之间的情谊。在他面前，她不仅脑子快，而且显得尖嘴薄舌，她知道任何形态的激扬文字挥斥方遒都不会伤害陆震。陆震和朱宁属于同一群体。有一次，她从市委一个副秘书长那里听到一件事情，说是一位部长老婆在家里设了个佛堂，对着一个很大的瓷像，每天顶礼膜拜，而她是一个党员。卢思敏气极了，她对陆震说，要么你信马克思，做共产党员；要么信释迦牟尼，做佛教徒！我甚至怀疑，在这位部长最深最隐秘的心井里，也有最不干净的东西！从他为儿子谋求职务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离开滚滚红尘！并没有进入清心寡欲的那种境界。卢思敏发了一番议论之后，觉得心里畅快多了。而且她总是这样，把最看不惯最想不通的事首先对陆震说，甚至不期望他赞同、附和，她只是觉得他们拥有着同一把尺子，来检验自己检验人生。

卢思敏对柳玉山也是作为学长来尊重的。他是人大的副秘书长。柳玉山是60年代初期的北大毕业生。论资排辈的话，做个学长绰绰有余。在卢思敏来人大常委会前，柳玉山管一半文秘工作，她的到职对柳玉山是一种解脱。他太善良。而这个世界残酷太多，权力场、金钱场到处弥漫着硝烟。在温文尔雅的面纱下，潜伏着毁谤、剥夺的危险，他斗不过另一个管材料的崔烨。他也是副秘书长。所有给主任们写的材料都得经过崔烨批示之后，才有见诸天日的可能。柳玉山自己写的也不能例外。如果说柳玉山负责把“文字”关的话，崔烨把的是“政治”关。卢思敏来了之后，柳玉山只分管研究室了。他这才能沉下心做点研究。他不愿敞开心扉，或者说，他的苦难已深深嵌入心里，成为他生命的一个部分。也许是他对卢思敏有了了解，也许是卢思敏对北大学生的那种“沆瀣一气”的衷情，两年之后，他们之间的交谈深入起来。朱宁去世之后，柳玉山很诚恳地邀请她到家里坐坐，她这才第一次迈入柳家。起初，他安慰她，要她尽快从悲哀中走出来。后来他自己喝了几杯酒，话题就转到他自己的遭际上来。他说，他进入写材

料这个行列纯属偶然。从开始进入材料班子起，心里就没踏实过。他不敢奢望以此作为进仕之阶，相反，他随时担心被逐出这支队伍。原来的孽根已成长为罪恶之树，在高估的百年人生中，将近四分之一的岁月里，一个袋子里有一份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东西。他1957年写得那首稚嫩的诗被定性为“右论”，按行数算下来，一行诗已经付出了三百六十五天的战战兢兢的昂贵的心理代价。当初写诗，不过是炫耀自己。但人类特有的虚荣心居然使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沉重陷入罪恶的深渊，缘于此，自然哲学抛弃了他，进了工厂成为工人阶级的反面教员。但他碰到了好人。反面教员却得到了“正面学生”的盛情“邀请”，让他进入了技术革新的殿堂，在“三结合”的构架中，把他列入“技术人员”，与“领导”、“老工人”平起平坐。然而，他并未受宠若惊，一如既往地谨慎从事。有一次，厂革委会主任要他陪着去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技改情况——那时候的提法叫做抓革命，促生产。他找了许多借口推辞这份盛情，但老头儿不允，只得跟去了。轮到他们厂汇报时，老头儿说，叫技术员说吧。这哪是“陪”呢？面对那么多部长、副部长，他不仅觉得低人一等，而且还伴着莫名的恐惧，仿佛自己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在这里冒充好人。开始，他汇报得很糟，许多套话说不周全，后来渐渐稳定下情绪来，整整说了四十分钟。他看到部长满脸赞许的神色，悬着的心才沉下来。大约是一个星期之后，市里筹备全市工业学大庆会议。厂革委主任又把他叫到办公室。老头儿满脸凝重，告诉他，部里要借他。他吓了一跳。像他这样的政治条件去谋高就，就等于引火烧身。便哭腔哭调地怨他违命。老头儿坚持说，我了解你，有事我负责，下级服从上级嘛。他开始进入了一幢办公楼。他谨言慎行，除了上厕所只在学大庆办公室呆着。开始，只是修改下面报上来的材料，他像个认真的语文老师批改作文那样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要改正过来。办公室主任由怀疑而赞许，最后凡经他手改过的稿子，他看也不看，

签了字就送印刷厂。这是份荣耀。男人那种搏斗欲望又悄然爬上心头。但他立刻提醒自己，挣脱藩篱的任何念头都是危险的。也许因为这样的自我约束，他才能以一个非党人士的“面目”先给机关进而给领导人物写材料了。这么多年来（当然指“右诗”平反前），一直秘而不宣并且受益匪浅的，究竟是什么呢？他说到这里呵呵笑了，笑得很直率。他说，不是我的综合素质，而是心理学上称之为的“人格面具”！我把自己封闭在这样的天地里，通过特有的办法与外部世界设法交流，那就是我在材料里出现的重要提法都源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它们是极权威的。在我的草稿中，每个观点标识着它的出处，因而，这份草稿只有我自己亲自保存。这是我的防弹衣，它使我一次次化险为夷。我被自己重新塑造。与朋友谈话时，我的话简练而规范；汇报工作时，如同在读一篇文章，有条有理有根有据；连给友人写信时，也要拟好草稿。不然投入邮筒，也必定疑窦丛生。这究竟是我的怯懦，还是我的成熟？是超越了自己，还是不幸的延续？——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带着强烈的自嘲。笑得有点疼人。好一会才镇定下来。

卢思敏和这位学长聊过许多次。他谈到“右诗”平反，谈到平反之后第二天的入党，以及眼下这个副秘书长。他说，他对这些转化缺的是心理适应，他把自己写的材料让崔烨审查，从未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别人看不惯，只是他们的事，大可不必按矛盾看待。这使卢思敏感到莫名的悲哀。之后，卢思敏多次到柳家作客，也领着蕾蕾去过四五次，使她认识了这个“柳伯伯”。

在女同志里，她去古芬的家。古芬是个打字员，她十七岁来人大打字，已经呆了五个年头了。她打字的速度很快，而且差错极少。她打字的姿势也美，身子挺直端坐在椅子上，两眼瞅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任什么嘈杂笑闹，都可以置若罔闻；最使卢思敏赞赏的是她的品德。假如今天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话，古